

浅谈西南旧志及古籍数据化整理

高国祥

(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 甘肃 兰州 730030)

【内容摘要】地方志是从史籍中演变产生的一种记载地方史料的著作形式,在历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文阐述了地方志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通过对西南地区历代郡县建制和旧志遗存、整理情况的分析性介绍,论述了古籍整理和数据化需要开展的学术阶段,以及当前古籍利用所面临的瓶颈问题,提出古籍整理的当务之急是弥补古籍传承相对出现的语言裂痕。古籍整理不仅要形式上复制,使其化一成百广为流传,更重要的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注释和繁简文字的转换等普遍适应社会阅读的基础整理工作。对古籍内涵充分理解,避免盲目崇拜,从古籍尤其是地方旧志中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

【关键词】古籍 整理 数据化 地方志

中图分类号 K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09)12-0114-04

西南地区在自然地理上是指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在人文地理上涵盖了渝、蜀、云、贵、藏五省(市)区以及桂西、湘西、鄂西和陕南、陇南等周边地区。区域面积约2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亿,包括汉族在内现生活着31个民族,是羌、苗等古老民族的传统聚集地。西南地区由于地理因素与中原相对独立,人口密集,民族众多,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客观上为古籍遗存的保护创造了条件,也为我们今天探索古代文明以及研究和利用古籍遗产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西南历代郡县建置

早在先秦时期西南就出现了巴、蜀政权,当时出巴蜀西南属于司马迁所说“巴蜀徼外”的“西南夷”。战国时期,约公元前四世纪为楚国领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蹻至滇池,……以兵威定属楚。”(《史记·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后楚并巴,秦灭巴蜀,西南始纳入中原王朝势力范围。此后近1500年间,历代对西南地区的统辖方式频繁变化,至元代以前从地域上讲除独立政权外,大体以四川盆地南麓、乌江为界,以北多系经制统治体系,以南多系羁縻统治体系。

秦初西南地区便进入郡县时代,全国设36郡,郡下设县。西南置巴郡、蜀郡、黔中郡,后补设桂林郡和象郡,象郡西部属于今天的云南省东部和贵州省东南部地区。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分成十三州刺史部,简称“十三州”,西南设益州刺史部,包括武都、汉中、广汉、巴、蜀、犍为、越巂、牂柯、益州九郡,以及荆州刺史部的南郡和武陵郡。三国为蜀汉地,益州分南北两部。北部设武都、汉中、阴平、梓潼、巴西、文山、巴东、广汉、东广汉、蜀、犍为、汉嘉、江阳、巴、涪陵等郡,南部置庾降都督下设越巂、朱提、牂柯、建宁、云南、兴古和永昌等郡。西晋时,设梁州、益州、宁

州,以及荆州西部的建平和武陵郡。

隋炀帝时,废除州制,恢复郡县制。西南北部设巴汉、岷蜀诸郡,南部设南宁州总管府。唐、宋、辽、金几代改用道、府、路的地方行政制度。唐代西南设有剑南、黔中、山南东和山南西四道,以及岭南道西部,政权并存有南诏国。五代时期,西南地区先后建立前蜀、后蜀、南汉(西部)、楚(西部)、长和、大理等政权。北宋设成都府、梓州、利州、夔州四路以及广南西路。南宋设成都府、潼州府、夔州、利州东、利州西五路。与两宋政权并存的有大理、土蕃等国。

元代以后,全国设立行省制度。元设四川、云南行省,湖广行省西部覆盖了今贵州、广西西部等地区,在西藏地区设立宣政院。明设四川、云南、贵州布政司,在今西藏、青海等地区设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清代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西南地区。

二、地方志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远在上古时期,就出现了《尚书》、《春秋》、《竹书纪年》、《山海经》等杰出的历史和舆地著作。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之说,历代编修的皇家实录、纪传体史书、编年体通鉴、纪事本末和方志等都统归史部,可见史籍在历代典籍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地方志是从史籍中演变产生的一种记载地方史料的著作形式,由于地方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的特殊性,历代中央史籍无法全面反映各地地方社会情况,因此方志之学便应运而生。随着朝历更替,历代疆域和地方建置的频繁变化,地方志的编纂范畴也由早期单一的舆地内容向综合性方向演进,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昌盛。“考据起来,由隋炀帝诏令天下各郡上呈当地风俗习惯及地图,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报人口一次,宋代又令闰月的年份要编图经上呈朝廷,皆是图经进展的实迹。”(何光谟《中国方志丛书导言》成文书局1967年出版)

今天我们见到最早的地方志是东汉的《越绝书》,最早的西南地方志是晋代的《华阳国志》。《越绝书》又称《越绝》、《越录》、《越记》等,是一部以记载吴、越史地为主的地方性史籍,记事上起春秋,下至秦汉。旧说《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伍子胥,明代学者从书末《篇叙外传记》隐语中读出“袁康”、“吴平”二名,又据书中有“建武二十八年”的文字,认定作者为东汉会稽人袁康、吴平。现今学者多以为《越绝书》非一人所作,可能始作于战国,至东汉经袁康、吴平辑录增删。《华阳国志》,原名《华阳国记》,东晋常璩撰,是一部专记古代西南地区及相邻陕、甘、鄂部分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的地方性史籍,记事自上古至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因所记之地略当《尚书·禹贡》之梁州,地在华山之阳,故以“华阳”名之。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省崇州市)人。以前有学者把它归入别史或杂史,但根据书中叙述的内容,作为地方志更为合理。

地方志的修纂之风自宋元兴起,倡于明代,盛于清代。今天遗存的大量方志主要是元代以后形成的著作,从编纂形式和内容上大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综合性地方志,以记载地方沿革疆域、职官人物、山川庙宇、礼俗祭祀、天文地理、物产民风等基本内容的地方志,按建置级别一般分为通志和府、州、县志。第二乡土志,以侧重记述物产民风并兼顾其它内容的志书,乡土志是由综合地方志演化形成,多产生于清代。第三专事记载山、水、盐、漕等单一内容的志书,称为专志。第四历代以舆图为主的著作。在综合志书内,根据编纂追溯年代将其分为通代志和段代志。通代志以有史可考为追溯上限,对前志内容进行考证补充。段代志以前志为追溯上限,是前志内容的延续。

由于方志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数据性和综合性等特征,被古人誉为“一邑之实录”、“一方之全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方性的百科全书。历代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编修,主要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和教化的需要,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质量以及修志的连续性,特别是自隋唐以后,我国方志编修一直未曾中断,从而形成了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中国方志长达两千余年的发展,为后人留下了数量庞大的文化遗产。

三、西南旧志的整理和出版情况

1932年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综录》中记载,历代遗存地方志约5000余种。根据1978年中国天文史普查整编组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对全国主要图书馆的统计,我国现存方志8200余种,10余万卷。其中,西南地区方志为1151种(不含专志),包括重庆地区121种,四川地区550种,云南地区291种,贵州地区142种,西藏地区47种。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主要出版的历代地方旧志有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和上海书店1990年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66至1986年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宋元方志丛刊》,上海书店、凤凰出版社和巴蜀书社1991至2006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2003年出版的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006年出版的《陕西省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2007年出版的《北师大藏稀见方志丛刊》等。甘肃省古籍文献编译中心在整理全国地方文献时,于1990年至2009年出版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一、二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一、二编)以及待出的《中国华东文献丛书》、《中国华北文献丛书》、《中国中南文献丛书》和《中国东北文献丛书》中设专辑集中收录了一批方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在史部地理类也收有一批旧志。此外,还有中国书店、广陵古籍刻印社以及各地古籍书店、图书馆于自藏的旧志中集中或零散地出版了一大批。这些方志数量庞大,具体数字尚无统计,尽管相互之间有重复现象,但基本上反映了历代旧志的遗存情况。

《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一、二编收录方志共计111种,包括重庆7种,四川24种,云南40种,贵州21种,西藏10种,专志9种。除《华阳国志》等早期著名志书外,总体以明清著作为主,包括通志、府志、州县志和各类专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万历《三峡通志》五卷。明吴守忠编辑、卢国祯校次,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刻本。框高22CM,宽15.2CM,白口,双鱼尾,双栏,半叶9行,行22字。书口下方有刻工元、胡、刘、古等字。吴守忠,高安(今江西省高安市)人,卢国祯,黄冈(今湖北省黄冈市)人,两人生卒年均不详。全书“首着三峡异同,次考,次诗歌词赋铭记,次附录”,卷首有吴守忠自序,卷末有兴山知县庐陵人(今江西省吉安市)旷骥跋文。此书是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于上世纪50年代,偶然从造纸厂待化浆的废纸中发现并抢救出来,经考证为传世孤本,现藏上海图书馆。该书是历代遗存唯一专志三峡的著作,收录历代诗歌词赋铭记较多,具有珍贵的学术和版本价值。

嘉庆《崇宁县志》四卷。刘坛纂修,清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刻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9行,行20字。刘坛,字杏圃,顺天府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人,生年不详,卒于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进士,时任崇宁知县。全书凡四卷,无目录,内厘53目。卷一序、图、天文、凡例、建制沿革、形势、山川、户口、田赋、水利、城池、津梁、古迹、公署、学校、祀典、祠庙,卷二风俗、兵制、铺递、武功、寺观、盐法、茶政、蠲政、职官、选举、封阴、政绩、人物(含忠义、孝友、烈女、善士、隐逸、流寓、仙释)、陵墓,卷三艺文上(含赋、诗、传、记),卷四艺文下(含记、序、书后、考、铭、纪、典籍)、物产、祥异、杂识、外纪、修志跋。卷前有刘坛自序和昭文人(今江苏省常熟市)张大鏊及溧阳人(今河北省丰润县)李自赓序,卷末有江钊跋文。全书卷四“祥异”、“杂识”和“外记”部分,于款首误刻“卷五十二”、“卷五十三”和“卷五十四”。全书涉猎广博,内容充实,是崇宁地区十分重要的史料著作。唯诸篇编次略显凌乱,且误刻较多,实属憾事。

同治《续汉州志》二十四卷首一卷补一卷。张超修、张敏行纂,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刻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9行,行21字。张超,字松岩,生卒年不详,曾任汉州知州,张敏行,字勉斋,陇西(今甘肃省陇西县)人,清道光二十

五年(公元1845年)进士,曾任四川隆昌知县,后在汉州主讲“讲道书院”,生卒年不详。该书卷首有陈元杰、曾履中、董鄂新和张敏行序以及张怀泗旧志序。《汉州志》前本有明万历三十年王大才、张一廉、黄鸣阳纂修本和清乾隆十一年张珽、侯国栋纂修本以及清嘉庆十七年刘长庚、侯肇元、张怀泗重修本三种。该书按八卦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集二十四卷。乾一集含卷首、卷之一天文、卷之二地理、卷之三崇祀;兑二集含卷之四职官、卷之五政绩、卷之六学校、卷之七选举、卷之八仕宦、卷之九儒林、卷之十耆寿;离三集含卷十一忠烈上、卷十二忠烈下、卷十三孝友、卷十四义士上、卷十五义士下;震四集含卷十六节孝上、卷十七节孝中、巽五集含卷十八节孝下、坎六集含卷十九古迹、卷二十祥异、卷二十一艺文上;艮七集含卷二十二艺文中、卷二十三艺文下;坤八集含卷二十四补遗。此书在前志基础上补充记载了大量史料,考校严谨有据、内容翔实可征,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乾隆《屏山县志》八卷续一卷。张曾敏、祝頌、陈琦纂修,清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刻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9行,行22字。张曾敏,桐城(今安徽省桐城市)人,字逊述,号鳧门,生卒年不详。清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由廪膳生授南陵县训导,时任屏山知县。卷前有叙州知府浮山人(今山西省富山县)段玠序和张曾敏自序。《续》一卷,敬大科、赵士恺等纂,清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补刻本。黑口,单鱼尾,双栏,半叶9行,行22字。前有赵士恺序文。屏山前无志,此为首志。张曾敏曾叙述“屏古夔国地也,汉属犍为郡,自唐宋迄元为马湖部,皆蛮人长之羁縻而已,明初安氏内附授为马湖守,世其职。宏治间改土为流官,添设屏治。国朝因之,雍正五年始省马湖府,以县属叙,其间割属滇南,又割属马边。边徼僻壤,分割靡常,苗民杂居,抚驭不易。令此者,亟求绥靖之方固,未遑修文事也”。全书内厘十门,卷之一舆地志,卷之二建置志、赋役志,卷之三学校志,卷之四秩官志,卷之五选举志、人物志,卷之六艺文志上,卷之七艺文志下,卷之八边防志、木政志、杂志。卷首为凡例、姓氏和图考。是志篇幅不多,但举目严谨、内容丰实,对清代以前屏山地区的商贾木政、边防兵备以及西南苗居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做了较为详尽的记载,为后世了解屏山的文化传承积聚了丰富可信的资料。

道光《印江县志》六章。郑世范撰,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成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刊刻。白口,单鱼尾,单栏,栏内无格,半叶11行,行28字。郑世范,凤翔(今陕西省凤翔县)人,生卒年不详,时任印江知县。是志以章为纲,分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和人物六章,目录后有撰者自序,书末有邑人廖袭华、饶永升付梓时跋文。该志虽然印制略显草漏,但流传稀少,较为珍贵。

西藏志书传世较少,现在已知的不到40种,主要有焦应旂撰《藏程纪略》、吴廷伟撰《定藏纪程》、杜昌丁撰《藏行纪程》、佚名撰《西藏志》、松筠撰《卫藏通志》、黄沛翹撰《西藏图考》、陈观浚撰《西藏志》、《卫藏图识》和《卫藏揽要》等,都是十分重要的藏学著作。

乾隆《卫藏图识》四卷。马揭、盛绳祖撰,乾隆五十六年

(公元1791年)刻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8行,行20字。马揭,字夕云,盛绳祖,字梅溪,生卒均年不详。全书内厘宸翰、识略上(含西藏源流考、卫藏全图、疆域、封爵、朝贡、纪年、岁节、兵制、刑法、赋役、征调、头目、衣冠、饮食、礼仪、婚姻、丧葬、房舍、医药、卜筮、市肆、工匠)、识略下(含山川、寺庙、物产、摭记)、蛮语(含天文门、地理门、时令门、人物门、身体门、官室门、器用门、饮食门、衣服门、声色门、释教门、文史门、方隅门、花木门、鸟兽门、珍宝门、香药门、数目门、人事门)四卷。后有铁岭(辽宁省铁岭市)人周琦跋文。该书成书付梓在《西藏志》问世五十年后,编纂时引征了部分《西藏志》内容。初稿为马揭撰,后有盛绳祖修定。康熙初年,盛绳祖祖父在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县)任职,其自幼年起便追随祖父在藏区生活了11年,“见闻较确,相与增删成帙,并证诸群书厘为五卷。”(跋文)其撰述内容丰富,取材真实可信,对藏学研究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卫藏揽要》六卷。邵钦权着,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抄本(序)。白口,无鱼尾,无框无栏,半叶10行,行20字。邵钦权,字季衡,东阳(今浙江省东阳市)人。该书以现代学人的角度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西藏的地理环境和宗教风俗以及历代军政情况,分稽古、山川、风俗、宗教、政治和兵制六卷,卷前有撰者自序和同窗李俊超序。是现代论述西藏问题不可多得的优秀著作之一。

专志也是《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收录的一大特色。其中乾隆《云缙山水志》不分卷。李荣陞撰,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问影楼丛书据聚珍版重印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12行,行30字。书口下方有“问影楼丛书”五字。李荣陞,字厚冈,万载(今江西省万载县)人,生卒年不详,约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前后在世,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进士,历任云南恩乐、峨峨等知县,后延主大理书院。该书卷末有胡思敬记。胡思敬(公元1869至1922年),字漱唐,号退庐,新昌(今浙江省新昌县)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进士,纂有《问影楼舆地丛书》、《问影楼丛刻初编》、《豫章丛书》等。全书不分卷,内容分山、川两部分,后附图说。

雍正《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不分卷。清黄士杰撰,雍正年间原刊,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沈兰生(平湖)人,浙江省平湖市)再刊,清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崔尊彝(太平)人,今四川省万源市)重刊本。白口,单鱼尾,双栏,半叶10行,行20字。黄士杰,生卒年不详,时任云南督粮水利副使。该书是清代著名的水利理论著作,内容分别为六河总图说、盘龙江图说、金汁河图说、银汁河图说、马料河图说、海源河图说和昆阳海口图说,未有沈兰生跋文。

此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还收录有明代《云南通志》、《云阳县志》、《夔州府志》、《合州志》、《新都县志》、《云南山川志》以及清代雍正《巫山县志》、《阿迷州志》、嘉庆《宜宾县志》、《罗江县志》、光绪《彭县志》、《秀山县志》、《普安直隶厅志》、《湄潭县志》、《顺宁府志》等等。这些志书虽然多为清代著作,但限于当时梓刻条件,再经过二、三百年的流传,现已稀少问世,十分珍贵,大部分度藏于国内图书馆或散失海外,当今学者若想查阅,已属不易。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以及各家学术单位和出版机构所进行的旧志初步整

理工作,应该说都是古籍保护的善举,定将益于后人,益于学术的发展。

四、地方志的整理和数据化问题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古籍文化遗产,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介质上来讲,任何纸质都有氧化寿命,加之长期性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幸存下来的任何古籍都应是十分珍贵的,因此,无论是保护、整理或开发、利用都是刻不容缓的系列性抢救行为。地方志和其它古籍一样,保护、整理和利用也是一项综合性工程,不能单一地去割裂考虑。保护是前提,整理是基础,利用和发扬是目的。

从语言发展史上我们了解到,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特定的发展进程,尤其是汉语书面语言经历了从上古、中古、近古文言到白话语言的逐渐演进过程。到了近现代,繁缛的书面文言向口头语言迅速转化,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简体字和现代汉语标点的推行,虽然极大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但从客观上也造成了书面语言传承链的相对断裂。第一,从阅读古籍的角度上说,当代年轻学者大部分都是文字改革以后成长起来的,书面和口头语言已十分接近,除专业学者外,对于历史书面表达习惯较为陌生,尤其是普通读者更是难以从传统古籍中汲取精髓,形成了利用和发扬古籍的社会性阅读障碍问题。第二,从文化传承的角度上讲,传承文化是全民族和全社会的自觉行为,原始状态下的古籍不做基础性整理,无法让社会普遍接受和理解,造成了后人的盲目崇拜,古籍当中所记录的大量珍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及浩瀚的文化真谛将有无法全面继承的危险。因此,古籍整理不仅要从形式上复制,使其化一成百广为流传,更重要的是对古籍进行标点、注释和繁简文字的转换等普遍适应社会阅读的基础整理工作,也就是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弥合已相对断裂的语言裂痕。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数字化技术已进入各个领域并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古籍数据化也提到了新的高度,2007年1月19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制定古籍数据化标准,规范古籍数字化工作,建立古籍数字资源库”的具体要求。地方志古籍数据化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数据化的形式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古籍影像数据化,就是将古籍原貌进行数据性复制,这样不仅比纸质复制节约成本,而且更宜于广泛流传。二是古籍文字数据化,即在影像数据化的基础上,利用最新古籍数据技术进行文字识别,并转换成word等宜于引用的文档,为图文对照、全文索引、多本校勘等研究工作以及综合古籍数据库创建基础平台。三是古籍应用数据化,古籍应用即古籍普遍性使用,让一般读者方便阅读和利用,对古籍进行标点、注释,并可在数据库中实现任意检索,充分发挥古籍数据化优势,以达到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近年来,个别地区和单位对单一地方志古籍数据化进行了类似的课题研究,但全面系统地将旧志进行数据化整理,将各地馆藏、民藏统一整合,还有待一个时间过程,它不仅都是一项庞大的学术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全国除国家图书馆和省、市(含县)级公共图书馆外,其它教学、科研、文博等机构以及古籍书店等单位都藏有历代旧志。藏书涉及的数千家单位,由于各自的性质和隶属关系不同,认识角度各异,加之有些单位墨守自成一体、互不通有的传统陋习,将“保护”视为“束之高阁”,因此,且不说民藏情况,仅整合国有系列古籍资源就将是一条漫长之路。

地方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翔实可信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甚至是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对旧志的整理和研究,近年所见较多。就整体而言,还局限在基础的影印整理,在初步研究上,尚未形成规模和系统。全面开展研究性整理是一项规划性极强的世纪课题,或分地区逐级按行政区域进行统筹立项,或进行纵向专题性研究,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总之,全面降低理解难度,充分利用旧志遗产,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是文化传承的有效方式之一,也是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上接第113页)[8]史记·货殖列传[M].

[9]史记·平准书[M].

[10]《盐铁论》之《复古》、《禁耕》

[11]《汉书·食货志》:“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12]汉书·董仲舒传[M].

[13]汉书·灌大传[M].

[14]汉书·食货志[M].

[15]贾谊集·时变[M].

[16]汉书·司马迁传[M].

[17]汉书·地理志[M].

[18]盐铁论·水旱[M].

[19]盐铁论·本议[M].

[20]杨宽.论秦汉的分封制[A].中华文史论丛[C].1980年第1辑.

[21]盐铁论·复古[M].

[22]梁玉绳等.史记汉书诸表宁补十种[M].中华书局,1982:46.

[23]汉书·吴王濞列传[M].

[24]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